



主编 / 戴永红 秦永红
副主编 / 王俭平 孟雪 杨茜

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区域合作

ZHONGGUO YU NANYA DONGNANYA QUYU HEZUO

互联互通的视角

HULIAN HUTONG DE SHIJIAO



四川大学出版社

字
书
主
编
副
主
编

主编 / 戴永红 秦永红
副主编 / 王俭平 孟雪 杨茜

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区域合作

ZHONGGUO YU NANYA DONGNANYA QUYU HEZUO

互联互通的视角

HULIAN HUTONG DE SHIJIAO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梁平
责任校对:李冬梅
封面设计:璞信文化
责任印制:王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区域合作:互联互通的视角 /
戴永红,秦永红主编.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614-9322-9

I. ①中… II. ①戴… ②秦… III. ①区域经济合作—
国际合作—研究—中国、南亚、东南亚
IV. ①F114.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4791 号

书名 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区域合作:互联互通的视角

主 编 戴永红 秦永红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9322-9
印 刷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15
字 数 273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 网址:<http://www.scup.cn>

内容简介

国际区域合作中的“互联互通”最早始于东盟推动经济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随着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倡议、李克强总理提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计划以来，“互联互通”日益成为亚洲区域与国家间合作的热词。习近平主席指出，互联互通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应该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本书针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南亚与东南亚国家的区域合作，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个方面，重点分析了互联互通在促进中国与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区域合作中的特殊作用和未来设想。全书分为五大部分十九章。

前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一直致力于中国“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建设，以创造性的战略思维进行“改革开放 2.0”的顶层设计与基础建设。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但传承了古今中外不同文明间交流的成功经验，更以时代的潮流去引领新一轮区域合作的深入，让中国的发展成为世界的机遇，进一步诠释了中国“睦邻、安邻、富邻”的一贯友好周边政策。2015 年 3 月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共同拟定和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愿景与行动》文件，明确了“一带一路”的推进路径，即“一带”聚焦在欧亚大陆，“一路”重点在东南亚及由此延伸至波斯湾和西亚北非。由于南亚的地理位置正处于“一带一路”发展路径之间，北上与“一带”的必经之地中亚相连，南下接通“一路”的必经之地印度洋，而历史上南亚亦因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在古丝绸之路的交集中发挥重要的影响。^① 本书正是基于南亚和东南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特殊地缘位置，从“互联互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视角去观察“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与东南亚部分沿线国家已经取得的成就以及未来可能存在的突破。

事实上，“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是相融相近、相辅相成的。政策沟通，是指在政策与法律上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保障，是其他“四通”的首要前提与基本保证。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的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的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

① 赵干城：《“一带一路”战略的南亚方向与印度的选择》，载《当代世界》，2015 年第 6 期。

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区域合作：互联互通的视角

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设施联通，是指发挥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优势，以跨地区合作为主要方式，为“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提供物质基础。2015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正式的开局之年，新丝路建设的初期将主要是以“道路联通”，也即基建、运输等基础设施项目为主，然后逐步深化并扩展至贸易畅通、民间交流等方面。目前我国已经在海外高铁合作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中巴、中缅、孟中印缅等多条陆上经济走廊也在顺利推进，这不但促进了中国外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周边国家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的“五通”原则中的核心，是关乎新丝路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如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是以“经济全球化”所引领的贸易世界，“一带一路”所倡导的贸易畅通既符合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愿景。而“贸易畅通”的实现并不仅仅是依靠于官方的推动，更是一次全民“改革开放”的总动员，是中国深入全球化的再次自我革命，最终也必然为世界的共同发展注入最强劲的动力。资金融通，是指通过人民币的国际化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通过货币的流通来加速整个区域合作与地区发展。在当前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不断减少全球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情况下，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第一大贸易国和主要的直接投资国，是完全有能力借助于“一带一路”倡议所提供的历史机遇，从而创造出国际合作的新模式与新理念，以实现更为高效的互联互通，并为世界的发展提供新的国际货币，组建新型的全球金融组织以及为消除地区局部战争和非传统威胁提供新办法、新手段等几个方面以扩大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为打造最能体现共赢合作理念的世界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基础。民心相通，是“互联互通”的精神与灵魂，直接决定了“一带一路”的成败与否，是关乎未来国家间建设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丝绸之路”所承载的不仅仅是贸易的往来，往往更多的恰是文化的交流，只有通过建立“文化的互识”，才能达成“交往的互信”，最终推动东西部世界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与资金融通”。因此，民心工程要求我国不断提高自身的软实力，加强中国关于“和平发展”理念的宣传，让世界人民更理解中国、欢迎中国，从而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

因此，“一带一路”的建设既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世界发展要求中国所承担的责任。中国应当继续秉持“和平发展”的理念，以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方式，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合作浪潮中，从而实现中国的梦想、世界的机遇。

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戴永红负责全书的策划、提纲的拟定和最后的统稿，参与撰写第一、二、三、十一、十二章；秦永红参与撰写第三、十一、十二章；王俭平参与撰写第十四、十八章；孟雪参与撰写第一、二章；李红梅撰写第四、六、七章；杨茜撰写第五、八、九章；刘红朝撰写第十章；解时红撰写第十三章；瞿萍参与撰写第十四章；刘晓燕参与撰写第十五章；代长友参与撰写第十五章；王祯撰写第十六、十七章；袁霖野撰写第十九章。由于作者众多，成稿时间差异较大，加之最后统稿时间仓促，本书错漏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诚望各位读者不吝指教，并谨向关心、支持和帮助本书出版的各界人士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戴永红

2015年12月于四川大学

序

当今时代，国际社会正在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并推动实施的建设“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构想，正是一条实现开放合作、促进互利共赢、打造命运共同体的智慧之路，更开启了一条面向未来全球发展繁荣、增进人类共同福祉的梦想之路，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把梦想变成现实，需要有共识，更需要有责任和行动。作为一所地处“一带一路”沿线上的高水平大学，四川大学始终把积极参与、应对和解决全球未来发展难题，为人类社会和“一带一路”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有所作为，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和担当。我校充分发挥自身的多学科优势、人才优势和国际交流合作平台优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与47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高水平大学共同发布了《敦煌共识》，发起举办了首届“一带一路”国家“能源、环境与商业文明国际会议”等系列高端国际论坛，与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加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分别共建了西部中国研究中心、亚洲研究中心等国际高端智库，特别是我校牵头组建的“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成为国家“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的理事单位，为应对和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重大问题贡献了川大人应有的智慧和力量。

当前，我们正在全面推进实施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行动计划，筹划设立“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奖学金，全面加强“一带一路”未来领导力人才培养；积极筹建实体性、国际化、智库型的“一带一路”及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院，为国家“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提供高水平的决策咨询；全面推动实施“环喜马拉雅区域”开放战略，努力打造服务“一带一路”


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区域合作：互联互通的视角

战略的高端研究平台、人才培养高地和国际高端智库。

作为学校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行动计划的一项内容，我们专门组织了多学科的知名专家、学者，编写“一带一路”战略研究系列丛书。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也必将为助推“一带一路”战略增添一份新的力量。

面向未来，我们将以这套丛书的出版作为一个新的起点，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起服务国家“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的责任和担当，携手社会各界，为“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的顺利推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四川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The image shows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which appears to be '李兴' (Li Xing), the name of the University of Sichuan president mentioned in the text above.

2016 年元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政策沟通

第一章	中印合作机制化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3)
第二章	中印合作机制化建设的总体框架	(20)
第三章	中国对中印合作机制化建设的对策	(36)
第四章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对策建议	(47)
第五章	中老泰快速铁路合作的对策建议	(58)

第二部分 设施联通

第六章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缘起	(69)
第七章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基础条件	(79)
第八章	中国-东盟陆上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现状和规划	(91)
第九章	中老泰快速铁路建设的现实基础	(95)
第十章	中印高铁合作前景探析	(105)

第三部分 贸易畅通

第十一章	中国四川-西藏与南亚国家次区域合作探析	(113)
第十二章	中国与南亚能源合作中的地缘政治战略考量	(129)
第十三章	南盟在促进地区合作与发展中的作用及前景展望	(143)
第十四章	中缅贸易便利化问题及解决方法	(157)

第四部分 资金融通

第十五章	中印投资与金融合作机制建设探析	(167)
第十六章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下中印金融合作	(177)
第十七章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下中印金融合作的影响因素	(187)

第五部分 民心相通

第十八章	“文化丝绸之路”中的儒学传播	(199)
第十九章	媒体报道对中印交往的影响	(209)
主要参考文献	(218)

第一部分 政策沟通

加强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的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的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

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区域合作：互联互通的视角

第一章 中印合作机制化建设的 必要性与可能性

从国际机制的功能来看，我们认为中印关系的机制化建设能够促进双方在各层次、各领域的合作，能有效解决双方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分歧，并培养起两国的共有观念，因此具有必要性。此外，从中印两国关系的现状来看，随着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相互依赖的加深、共同利益的扩展、印巴关系的好转、美国因素的有限性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机制化建设经验的借鉴，使中印关系的机制化建设具备了实现的可能性。中印两国政治家应当抓住机遇，从战略高度认知并推动中印关系中的机制化建设。

一、国际机制相关概念的界定

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理论是在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最早提出并发展了国际机制的概念。1971年，格雷厄姆·艾利森出版《决策的实质》一书，以古巴导弹危机为历史背景，详尽分析了此次危机期间美苏双方的决策过程，突破了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模式，首次提出了三种对外决策模式，即“理性模式”“组织机构模式”和“政府政治模式”。^①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一些学者将国际机制的概念引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约翰·鲁杰（1975）在《多边主义》一书中最早将国际机制概念引入国际政治经济研究领域，提出了三种制度化层析的观点，研究的重点

^① 周桂银：《国际关系局部理论与当代史案例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Graham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转向国际关系中的跨国组织和政府间的行为者，从而动摇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① 随后学者们开始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来界定国际机制的概念，其中有三个概念最具代表性。一是斯蒂芬·克拉斯纳将国际机制定义为“在某一特定问题领域里，组织和协调国际关系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②。二是普查拉和霍普金斯两位学者将国际机制界定为“一种国际行为的特定模式”，具有相应的“原则、规范和规则”，即“国际行为的制度化”。^③ 他们把国际机制分为正式的国际机制和非正式的国际机制两类^④，其划分的标准是这些机制中的协议和承诺是否经过立法形式来达成^⑤。三是奥兰·扬等人将国际机制定义为“国家间的多边协议”。由此可见，上述三个典型的概念说明了国际机制由三个要素构成，即分别是“共同的国际行为模式，协调国家间关系的原则、准则、规则和决策程序，以及限制在某一特定的国际问题领域”^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基欧汉对国际机制给予了最为充分、彻底的阐释。随着全球相互依赖程度的增强而兴起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一个最大亮点是它的合作理论。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一书中正式运用国际机制研究国际问题，以独特的视角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建立了特别的分析模式来解释国际制度的变化。^⑦ 他采纳了斯蒂芬·克拉斯纳的观点，认为国际机制是“一系列围绕行为体的预期所汇聚到的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而形成的隐含的明确的原

① 约翰·鲁杰主编，苏长河等译：《多边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转引自郭丽：《国际机制理论研究初探》，《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11期。

② 斯蒂芬·克拉斯纳：《国际机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转引自朱杰进：《国际制度缘何重要——三大流派比较研究》，《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③ Stephen Haggard and Beth Simon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ummer 1987. 转引自郭耀华：《北京大学中观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 Donald Puchala and Raymond Hopkins, “International Regimes: Lessons from Inductive Analysis”, in Stephen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65. 转引自朱杰进：《非正式性与G20机制未来发展》，《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2期。

⑤ Kenneth Abbott, Anne-Marie Slaughter, Robert Keohane and Duncan Snidal, eds., “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3, 2000, pp. 401-421. 转引自朱杰进：《非正式性与G20机制未来发展》，《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2期。

⑥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0页；郭耀华：《北京大学中观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⑦ 罗伯特·基欧汉、小约瑟夫·奈著，林茂辉等译：《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①而“机制化”就是建立机制的程序和过程。

中印是两个比邻而居的崛起中的大国，在当前的发展和互动中双方的合作空间广阔，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矛盾。因此，本章试从国际机制的主要功能入手来论证中印合作中的机制化建设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

二、中印合作机制化建设的必要性

（一）机制化建设是促进中印两国多层次、宽领域合作的助推器

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社会中的霸权国的存在是实现国际合作的先决条件。因为霸权国凭借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强大能力能够向国际社会提供大量的“公共产品”（public goods），包括国际安全体系、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稳定的货币金融体系等等，而“公共产品”具有非分割性、非排他性和共享性的特征，这就使得其他国家在不付出成本或付出很小成本的情况下就能享受到公共产品所带来的收益，因此其他国家愿意参与到霸权国所领导的国际合作中去。但是按照该理论的逻辑，国际合作将非常脆弱，因为此种合作建立在霸权基础之上，一旦霸权衰落，国际合作将陷于停滞，国际社会将重新陷入无序或失序的混乱状态。20世纪70年代美国霸权出现衰落，面对国际社会对霸权衰落之后国际合作将陷于停滞的这种担忧，基欧汉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认为“霸权后的国际合作是可能的”。这一观点超越了霸权稳定论关于国际合作与国际机制的观点，即认为国际机制的创设和运行是因为国家的需要，国家需要创设国际制度以摆脱囚徒困境，因此国际机制并不完全依赖于霸权的存在。^②基欧汉接受了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理性自私的前提假设，但他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必然意味着国与国之间就是霍布斯式的战争状态；国家

① 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② 彼得·卡赞斯坦主编，秦亚青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转引自王学军：《从霸权合作到霸权后合作——基欧汉国际机制功能理论的论证逻辑与进步性分析》，《兰州学刊》，2007年第7期。

也的确按照自身利益行事，但这并不否认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着利益互补的事实；因此，霸权后的国际合作是可能的。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虽然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国家是统一的理性主体，这种理性思维使国家认识到只有通过相互合作才能实现自身利益^①，因此他们会努力创设条件达成合作；新自由制度主义撇开了相对收益对合作的限制作用，认为在相互依存和全球化日益发展以及人类“共同利益”领域不断扩大的今天，靠单个国家来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国际合作才是国际关系的实质；另外，新自由制度主义尤其重视制度在促进国家间合作方面的作用，即为了“增进共同利益，减少交易成本”^②，国家之间就必须创设制度，使行为者通过制度合作获得各自的收益。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曾指出的：“国际制度赋予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能力，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得到共同利益。”^③虽然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可以制约国家间的合作，但是各国在“国际制度”的安排下，是可以实现合作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从各国利益的相互性来看，即使中央权威缺失，追求自身利益的国家也会选择相互合作。^④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如果双方认识到合作能使双方都得到实惠，那么在国际制度的协调下，国家之间的合作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稳定的。

从客观现实来看，中印两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国家层面上，两国都是人口大国，解决贫困问题和实现社会公平是双方政府共同关注的议题；两国经济增长迅速，经济结构互补性强，发展经贸合作潜力巨大；两国同为崛起中的大国，同处于战略机遇期，面临着相同的崛起困境。地区层面上，两国都有着成为世界大国的战略诉求，因此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以保障其国内经济社会建设。国际层面上，中印是两个崛起的新兴大国，也是金砖国家中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从经济前景来看也是国际上最看好的。因此，中印两个大国对未来的全球治理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

① 靳利华：《冲突与合作——制度视角下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之比较研究》，《邢台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② 靳利华：《冲突与合作——制度视角下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之比较研究》，《邢台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③ 靳利华：《冲突与合作——制度视角下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之比较研究》，《邢台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④ 靳利华：《冲突与合作——制度视角下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之比较研究》，《邢台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